

契丹辽朝国家经济区域整合的历史轨迹

王明前

(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福建厦门 361005)

摘 要 契丹辽朝的国家经济区域整合,在先后经历了对上京道契丹本部的移民开发、对辽东地区移民的农业恢复以及接收燕云地区后实施的劝农政策,为契丹辽朝在各地区域经济发展,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经济区域整合准备了条件。中京的营建成为这一进程的起点和契机。随着澶渊之盟后整个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和平建设,国家政治方向从对外扩张转向内敛,各经济区域之间的整合趋势日益加强。中京的营建促进了以五京所置财赋机构为管理手段的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行政格局的形成。在国内商业体系逐渐完备的同时,国家经济也由于与宋朝的官方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而融入东亚经济贸易圈中。以中京为中心的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备加强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凝聚力,而边防城的屯垦则为这一经济统一提供了外部保障。

关键词 契丹辽朝 经济区域整合 中京 边防城

DOI:10.13780/j.cnki.63-1060/g4.2015.01.001

史学界对契丹辽朝经济史的研究已经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学者们凭借有限甚至稀缺的史料,对契丹辽朝几大生产部类做出了深入而系统的探索。^[1]笔者在对前辈和同仁的学术成就充满敬仰之余,也有几许疑问。如有前辈学者认为:“辽朝实质上不过是一个暂时与中原王朝对立的边疆王朝。因为辽朝与五代、北宋的边界并没有民族经济和地理的任何基础,它完全是人为的,是辽朝统治阶级与五代、北宋统治阶级之间力量对比暂时达成一种均势的产物。”^[2]该论客观上否定了契丹辽朝存在统一的国家经济体的可能。另有前辈学者认为:“契丹帝国实包括两个国家,一由契丹以及以外各族人组成,一由汉人组成,由辽帝转委汉大臣统治之。”^[3]从现象而言,该论颇有见地。但是这似乎从侧面暗示契丹辽朝缺乏内部整合的能力。笔者不揣浅陋,拟在现有研究的基础上,循契丹辽朝区域经济发展的脉络,从经济区域整合^[4]的角度,对契丹辽朝经济做宏观鸟瞰,以期增加学术界对这一领域的学术认知。

一、以上京为中心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农业经济区的开发

以上京临潢府为中心的契丹本部本来是典型的草原畜牧经济区。但是契丹统治者在与中原农业经济区的经济往来中,逐步有计划地引入农耕经济因素,主动而积极地接受农业文明的浸染。早在契丹辽朝前史时期,“皇祖匀德实为大迭

烈府夷离董,喜稼穡,善畜牧,相地利以教民耕。仲父述澜为于越,飧国人树桑麻,习组织,太祖平诸弟之乱,弭兵轻赋,专意于农,尝以户口浩繁,辖远,分北大浓兀部为二部,程以树艺,诸部效之”^[5]。然而作为国家政策推行的对契丹本部的农业开发还是在太祖耶律阿保机建国后开始的。阿保机在对中原连续用兵的过程中,把俘获的汉族俘虏强制移民到以上京临潢府为中心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围绕科尔沁沙地,建立起一系列以农耕经济为主要经济形式的州县。太祖执政后期,契丹辽朝征服渤海国,于是渤海人俘虏移民成为契丹本部农业州县新的人口来源。通过汉、渤海等俘虏移民来推动契丹本部农业州县的设置,从而实现对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农业开发,对产业结构做结构性调整的过程,在太宗时期达到高潮。兹对这些州县的建置情况做一梳理:

怀州 太宗行帐放牧于此,天赞中从太祖破扶余城下龙泉府,俘其人,筑寨居之。会同中,掠燕蓟所俘亦置此。

临潢县 太祖天赞初南攻燕蓟,以所俘人户散居潢水之北。县临潢水,地宜种植,户三千五百。

长泰县 本渤海国长平县民。太祖伐大,先得是邑,迁其人于京西北,与汉民杂居,户四千。

定霸县 本扶余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余,迁县人于京西,与汉人杂处,分地耕种。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长宁宫。户二千。

收稿日期 2014-08-22

作者简介 王明前(1971-),男,江苏苏州人。厦门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中国古代史。

保和县 本渤海国富利县民。太祖破龙州，尽徙富利县人散居京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潞县 本幽州潞县民。天赞元年太祖破蓟州，掠潞县民，布于京东，与渤海人杂处。隶崇德宫。户三千。

易俗县 本辽东渤海之民。太平九年，大延琳结构辽东夷叛，困守经年，乃降。尽迁于京北，置县居之。是年又徙渤海叛人家属置焉。户一千。

迁辽县 本辽东主多县渤海人。大延琳叛，择其谋勇者置自左右。后以城降，戮之，徙其家属于京东北，故名。户一千。

渤海县 本东京人。因叛，徙置。

宣化县 本辽东神化县民。太祖破鸭绿府，尽徙其民居京之南。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人户置，隶彰愍宫。户四千。

长霸县 本龙州长平县民。迁于此。户二千。

咸宁县 本长宁县。破辽阳，迁其民置。户一千。

越王城 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因建城，在(祖)州东南二十里。户一千。

扶余县 本龙泉府。太祖迁渤海扶余县降户于此。世宗置县。户一千五百。

显理县 本显理府人。太祖伐渤海，俘其王大。迁民于此，世宗置县。户一千。

玄德县 本黑山黑河之地。景福元年，括落帐人户徙便居之。户六千。

富义县 本义州。太宗迁渤海义州民于此。重熙元年降为义丰县，后更名。隶弘义宫。

泰州 本契丹二十部族放牧之地。因黑鼠族累犯通化州，民不能御，遂移东南六百里来建城居之，以近本族。州隶延庆宫。

兴国县 本山前之民，因罪配至此。兴宗置县。户七百。

长春县 本混同江地。燕蓟犯罪者流配于此。户二千。

乌州 本乌丸之地。东胡之种也。辽北大王拔刺占为牧，建城。后官收。隶兴圣宫。

爱民县 拔刺王从军南征，俘汉民置于此，户一千。

长宁县 本显德府县名。太祖平渤海，迁其民于此，户四千五百。

义丰县 本铁利府义州。辽虽破之，迁其民于南楼之西北，仍名义州。重熙元年废改今名。户一千五百。

广义县 本回鹘部牧地。应天皇后以四征所俘居之，因建州县。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来远县，十三年并入。户二千五百。

龙化县 太祖东伐女直，南掠燕蓟，所俘建城置邑。户一千。

永安县 本龙原府庆州县名。太祖平渤海，破怀州之永安，迁其人置寨于此，建县。户八百。

长乐县 本辽城县名。太祖伐渤海，迁其民建县居之。户四千，内一千户纳铁。

临河县 本丰永县人。太宗分兵伐渤海，迁于潢水之曲。户一千。

安民县 太宗以渤海诸邑所俘杂置。户一千。

头下州

成州 圣宗女晋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户四千。

懿州 圣宗女燕国长公主以上赐媵臣户置。户四千。

渭州 驸马都尉萧昌裔建。尚秦国王隆庆女韩国公主，以所赐媵臣建州城。户一千。

壕州 国舅宰相南征，俘掠汉民居辽东西安平县故地。户六千。

原州 本辽东北安平县地。国舅金德俘掠汉民建城。户五百。

福州 国舅萧宁建。南征俘掠汉民居本北安平县故地。户三百。

横州 国舅萧克忠建。部下牧人居汉故辽阳县地，因置州城。户二百。

凤州 南王府五帐分地。户四千。

遂州 南王府五帐放牧于此。户五百。

丰州 本辽泽大部落，遥辇氏僧隐牧地。户五百。

顺州 横帐南王府俘掠燕蓟顺州之民建城居之。户一千。

间州 罗古王牧地。近医巫闾山。户一千。

松山州 本辽泽大部落。横帐普古王牧地。户五百。

豫州 横帐陈王牧地。户五百。

宁州 本大贺氏勒德山,横帐管宁王牧地。户三百。^[6]

通过以上上京道地区州县设置情况可得出如下结论:首先,契丹统治者对中原和渤海原农业地区的征服,不再如历史上大多数游牧民族接触先进的农耕文明时采取所谓“入主中原”模式,或整个民族被所征服的先进文明所“同化”,或将游牧生产方式和社会组织强加于中原农业区,而是采取将征服地区人民尽可能以原行政单位为单位复制移民到草原地区,在接近原移出地区农耕条件的地区,不是以草原社会习惯的部族形式,而是以农业社会习惯的州县行政方式,将汉、渤海等族人民加以编户组织。尽管上引史料信息残缺,但仍然依稀可推断契丹统治者强制移民的基本倾向。如临潢县是基于“县临潢水”利于农业灌溉从而“地宜种植”的优良农业生产条件。再如许多州县几乎是人口整体移民复制到草原上,如“定霸县,本扶余府强师县民。太祖下扶余,迁县人于京西”。再如“潞县,本幽州潞县民。天赞元年太祖破蓟州,掠潞县民,布于京东”,甚至沿用原来县名。对非农业民族也采取州县行政方式加以编户。如“越王城,太祖伯父于越王述鲁西伐党项吐浑,俘其民放牧于此”,只是仍然维持其游牧经济现状。

其次,契丹统治者对上京地区的开发和经营,是采取斡鲁朵州县和头下州县并行的方式,对汉族渤海等族人民强制移民。既然这些移民或为战争俘虏,或为罪犯役人,那么他们的社会地位便不可能具有自耕农的独立地位。斡鲁朵是契丹辽朝皇帝私有的社会经济组织,具有独尊的政治特权和经济自主性,带有封建领主庄园经济条件下的自然经济特点,贯穿契丹辽朝历史始终。所谓“辽国之法,天子践位置宫卫,分州县,析部族,设官府,籍户口,备兵马,崩则扈从后妃宫帐,以奉陵寝。有调发则丁壮从戎事,老弱居守”如是。^[7]因此,斡鲁朵州县的性质与中原州县存在差别。一条来自宫官的墓志铭提供了如下信息:“(重熙)七年冬(张绩)俾权延庆宫汉儿渤海都部署司判官。嗣岁秋,朝廷以县者诸侯之封国,以百姓为本”。^[8]所谓“诸侯之封国”,立足于诸侯即

斡鲁朵主的权威。可是,契丹辽朝皇帝在自己私有的宫卫制度中采行州县地方行政,并不妨碍自身游牧民族传统政治习惯的延续,却仍然能够发挥这些移民固有的生产技能,然而又能避免如北魏被全盘汉化而失去民族特性之虞。斡鲁朵民户分为正户和蕃汉转户两种类型。正户为原契丹平民,蕃汉转户的来源可从《辽史》中的一段记载得知:“皇帝即位,凡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皇帝亲览间田,建州县以居之,设官治其事”。^[9]这说明蕃汉转户之来源便是上述“征伐叛国俘掠人民,或臣下进献人口,或犯罪没官户”这类社会地位低下的社会成员,特别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会随主人的去世而得以摆脱。

除皇帝外,王公贵族也依例建立起这样的社会组织,称“头下军州”,所谓“诸王外戚大臣及诸部从征俘掠或置生口,各团集建州县以居之。横帐诸王国舅公主许创立州城,自余不得建城郭。朝廷赐州县额”^[10],这些通过“从征俘掠”建立的州县,以上福州、原州等均是。而所谓“置生口”则似乎周延甚广。或由皇帝赐公主驸马媵臣即斡鲁朵宫户,或以原部族放牧之地安置部民。

总之,契丹统治者对来自原农耕社会的移民是采取强制管理的方式,中原和渤海农业社会的州县名义不能掩盖契丹辽朝社会生产关系中这一源于游牧民族征服前提下强制管理和强迫劳动的实质。虽然斡鲁朵和头下方式带有封建庄园经济的特点,但是由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农业生产条件无法与中原地区相比,因此依靠自发从农业先进地区招揽移民难以收到实效,而大规模移民则必然要通过强制性的暴力手段。同时,也只有强制管理甚至强迫劳动,才能够在辽阔的草原上播撒下农耕生产方式的种子。

再次,值得注意的是,有研究者发现,契丹统治者建立的这些移民州县,“一方面选择在与契丹历史有关的地方,另一方面受环境影响,表现出围绕科尔沁沙地呈环状分布的特征”。^[11]潢水即西拉木伦河东西向横贯沙地,上述州县从沙地西北方向的上京临潢府、祖州、怀州,逆时针依次为饶州、仪坤州,南至降圣州、龙化州,直达东端的乌州分布。沙地环境不仅影响了新垦区的生产条

件,而且自然地将上京地区分割为两个相对独立的经济区域。一为依赖潢水灌溉的临潢府地区,一为和东京道毗邻的医巫闾山北端经济区。前者是韩鲁朵州县集中的区域,后者则是头下州县麋集之所。以上京为中心,集中了祖州、怀州、仪坤州等与契丹政治文化及图腾崇拜相关的州城。如祖州,“太祖秋猎于此,始置西楼”,后以高祖、曾祖、祖考、皇考出生地故名祖州。^[12]怀州则因太宗怀陵建此,故“大同元年,世宗置州以奉焉”。后穆宗也葬于此。再有仪坤州,为太祖述律后出生地,因而建州。^[13]而北医巫闾山区则居于上京、中京和东京三大行政区的交汇之处,集中了上京道的福州、原州、渭州、壕州、横州、闾州、顺州和中京道的懿州。前者的意义在于作为契丹辽朝发祥地和政治文化中心区的上京临潢府地区,由于移民州县的复制,得以获得农耕经济的滋养;而后者则不仅具有拱卫政治中心腹地的战略屏障作用,同时由于地处三道要冲,而具有联系上京道西拉木伦河流域、中京道土河即今老哈河流域以及辽东三个农耕与畜牧混合经济区的枢纽作用。虽然碍于沙地阻隔,契丹统治者仍然通过木叶山民族图腾崇拜胜地的营造和附近永州、奉圣州的建置,为西拉木伦河、北医巫闾山两个农耕畜牧经济区之间建立起过渡性桥梁。永州为“承天皇太后所建。太祖于此置南楼。乾亨三年置州。东潢河南土河,二水合流,故号永州。冬天月牙帐多驻此,谓之冬捺钵。境内木叶山上建始祖庙,供奉契丹始祖奇祖和可敦二可汗”^[14]。潢、土二河的合流被附会为契丹民族的创世传说青牛白马传说,使木叶山成为契丹民族的图腾崇拜圣地。而降圣州“本大部落东楼之地。太祖春月行帐多驻此。应天皇后梦神人金冠素服……因而有生太宗”^[15],故名。地理志未说明二州民户的来源情况,但根据其他同类州县情况可推断仍然属于移民州县。

以上京为中心的西拉木伦河流域经济区的经营,据研究论证,到11世纪前期由于人口容量饱和,农业开发已经达到极限。考虑到脆弱的自然生态环境和大量政治型消费城市的供养压力,近百年西拉木伦河流域农业生产的成就仍然值得肯定。据推测,上京道地区的农业人口有35万,而非农业人口达到40万。^[16]

同时上京道地区的商业活动也渐趋活跃,上京更成为草原上的商业中心。^[17]上京道地区的商业活动始自“太祖置羊城于炭山北,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上京开辟有专门的商业区从事商业活动,“南城谓之汉城,南当横街,各有楼对峙,下列井肆。南门之东回鹘营,回鹘商贩留居上京,置营居之”。^[18]被掳汉人胡峤在公元947年目睹上京“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伎术教坊角秀才僧尼道士皆中国人,而并汾蓟幽之人尤多”,^[19]可证上京地区移民开发除以农业开发为主要生产方向外,也是一座商业繁荣,手工业集中,而且具有文化娱乐功能的草原都市。

因史料残缺,其他上京道地区城市的商业活动已难寻踪迹。唯祖州“东南横街,四隅有楼对峙,下连市肆”^[20],可窥一斑。祖州作为一个以政治图腾崇拜为特征的城市,在上京地区具有一定典型性。又从头下军州“官位九品之下及并邑富贾之家,征税各归头下,唯酒税课纳上京盐铁司”^[21],不仅可见头下州县的商业活动已形成“并邑商贾之家”这样的职业集团,而且从上京盐铁司与头下主对税收的分割推断其商业活动已达到相当规模。因此,上京草原地区的农业开发和商品经济发展是具有相当前瞻性政治规划指导下的经济活动。前辈学者强调燕云州县对草原开发的影响,称“燕云州县刺激着头下州城和牧区,头下城在燕云影响下又影响着契丹本部,形成波浪式的连锁影响”^[22]。但上京草原地区的开发早在燕云州县并入前就有计划展开,至少是同步进行。同时亦有前辈学者注意到“凡是两种文化不同的民族,互相接触,都可以发生聚族别居的现象”。具体辽初“汉城”则“汉人与契丹人初相接触,聚族别居,自为汉城则全受历史因果关系的支配”^[23]。其实,汉人移民基本属于被强制迁徙,如此刻意强调所谓历史因果关系则会轻易忽视契丹统治者移民政策的政治用心。

二、辽东和燕云农耕经济区的恢复和维护

辽东经济区的开发源于太祖末期对渤海国的征服。相关情况可通过下列州县设置的信息获得:

定州 高丽置州。圣宗统和十三年升军,迁辽西民实之。

定东县 高丽所置。辽徙辽西民实之。户八

百。

保州 高丽置州。圣宗以高丽王询擅立，问罪不服。统和末，高丽降。开泰三年去其保定二州，于此置榷场。

来远县 初徙辽西主多县实之，又徙奚汉兵七百防戍焉。户一千。

宣州 开泰三年徙汉户置。隶保州。

辰州 本高丽盖牟城，并邑骈列，最为冲会。辽徙其民于祖州。

来远城 本熟女直地。统和中伐高丽，以燕军骁猛，置两指挥，建城防戍。

海州 本沃沮国地。太平中大延琳叛，南海城坚守，经岁不下。别部酋长皆被擒，乃降，因尽徙其人于上京，置迁辽县，移泽州民来实之。户一千五百。

涿州 本高丽故国，渤海号西京鸭建立涿府。大延琳叛，迁余党于上京，置易俗县居之。在者户二千。

显州 本渤海显德府地。世宗置以奉显陵。以人皇王爱巫闾山水奇秀，因葬焉。应历元年，穆宗葬世宗于显陵西山。隶长宁积庆二宫。

奉先县 本汉无虑县。世宗析辽东长乐县民以为陵户，隶长宁宫。

山东县 本汉望平县。穆宗割渤海永丰县民为陵户，隶积庆宫。

归义县 初置显州。渤海民自来助役，世宗嘉悯，因籍其人户置县，隶长宁宫。

康州 世宗迁渤海率宾府人户置，属显州。初隶长宁宫，后属积庆宫。

宗州 耶律隆运以所俘汉民置，圣宗立为州，隶文忠王府。王薨，属提辖司。

乾州 本汉无虑县地。圣宗统和三年置以奉景宗乾陵。隶崇德宫。

奉陵县 本汉无虑县地。括诸落帐户助营山陵。

延昌县 析延昌宫户置。

海北州 世宗以所俘汉户置。地在闾山之西，南海之北。

贵德州 本汉襄平县地。太宗时察割以所俘汉民置。后以弑逆诛，没入焉。圣宗建贵德军，后更名。隶崇德宫。

沈州 本挹娄国地。渤海建沈州。太宗置

兴辽军，后更名。初隶永兴宫。后属积庆宫。

乐郊县 太祖俘蓟州三河民，置三河县，后更名。

灵源县 太祖俘蓟州吏民，建演阳县，后更名。

广州 汉属襄正县，高丽为当山县，渤海为铁利郡。太祖迁渤海人居之，建铁利州。统和八年省。开泰七年以后以汉户置。

辽州 本拂捏国城。渤海为东平府。太祖伐渤海，先破东平府，迁民实之。太宗更名始平县。隶长宁宫。

祺州 本渤海蒙山地。太祖以檀州俘于此建檀州，后更名。隶弘义宫。

庆云县 太祖俘密云县民，于此建密云县。后更名。

遂州 本渤海美州地。采访使耶律颇德以部下汉民置。穆宗时颇德绝嗣。没入焉，隶延昌宫。

通州 本渤海扶余国王城。渤海号扶余城。太祖攻龙州，圣宗更今名。保宁七年以黄龙府叛人燕颇余党千余户置。

双州 本挹娄国故地。渤海置安定郡，沅里僧王从太宗南征，以俘镇定二州之民建城置州。察割弑逆诛没入焉。故隶延昌宫，后属崇德宫。

银州 本渤海富州，太祖以银冶更名，隶弘义宫。

永平县 本渤海优富县地，太祖以俘户置。

东平县 本汉襄平县地。产铁，拨户三百采炼，随征赋输。

咸州 本高丽铜山县地，渤海置铜山县。地多山险，寇盗以为渊藪，乃招平营等州客户数百建城居之。初隶赫里太保城，开泰八年置州。

信州 本越喜故城，渤海置怀远府。圣宗以地邻高丽，开泰初置州，以所俘汉民实之。

武昌县 本渤海怀福县地，析平州提辖司及豹山县一千户之。

定武县 本渤海豹山县地，析平州提辖司及乳水县人户置。

宝州 本渤海城。统和十七年，迁兀惹户置刺史于鸭子混同二水之间，后升。

龙州 黄龙府 本渤海扶余府。太祖平渤海还，至此崩，有黄龙见，更名。保宁七年，军将燕颇叛，府废。开泰九年迁城于东北，以宗州檀州

汉户一千复置。

顺化城 开泰三年以汉户置。

宁州 统和二十九年伐高丽,以渤海降户置。

衍州 以汉户置。

连州 以汉户置。

归州 太祖平渤海,以降户置,后废。统和二十九年伐高丽,以所俘渤海户复置。

隶州 重熙十年州民亡入女直,取之复置

祥州 兴宗以铁骊户置。^[24]

以上信息并不完整。许多州县根本未提供任何人口来源信息,故未列入。即使以上有零星人口信息者也有未说明民户性质者,甚至未做时间界定。即便如此,仍可通过上述信息了解以东京辽阳府为中心的辽东经济区的经营情况。首先,契丹统治者对辽东的移民,其建州设县的基础,基本上有渤海甚至汉代辽东州县故地做参照,属于旧行政区划的恢复,因此其农业生产的恢复情况可以汉唐时期辽东的生产规模为参照;其次,契丹辽朝对辽东的开发经历了从太祖、太宗一直到圣宗的全过程。从太祖、太宗时期开始,契丹统治者便开始把从燕蓟、渤海俘获的民众强制移民到辽东地区。同时,契丹辽朝还有一次把原渤海国居民,从以第二松花江、牡丹江和图们江流域为核心区域的渤海国,向辽河流域的辽东地区强制移民的大规模行动。期间契丹族政治家耶律羽之的建议又起了决定性作用。羽之在太祖平定渤海后被任命为东丹国中台省右次相。他在太宗即位后上表,以渤海国人“今居远境,恐为后患”为由,谏议太宗将其向辽东强制移民,所谓“梁水之地乃其故乡,地衍土沃,有木铁盐渔之利。乘其,徙迁其民,万世长策也。彼得故乡,又获木铁盐渔之饶,必安居乐业”。结果“帝嘉纳之。是岁,诏东丹国民于梁水,时称其善”^[25]。这样,一部分渤海人如上文所述,除整体按原行政单位迁徙到上京地区充实契丹本部腹地外,另一部分则如耶律羽之谏议被迁往辽东地区。可是从辽史的记载中却难以寻觅到多少线索。或许地理志中辽东地区一些未提供明确人口来源的州县,其移民来源恰恰来自于这一行动。

继太祖后,在辽东建立州县的另一次高潮是在圣宗时期。一方面圣宗为防御高丽,在鸭绿江

一带设立了一系列州县拱卫辽东腹地,如保州;另一方面圣宗在平定大延琳渤海人叛乱后,对叛乱者家属和叛乱地区民户采取了强制移民政策,如淶州。另有一些州县的设置有特殊目的,或因为特殊经济目的,如银州;或由于应付具体社会环境而设,如咸州。总之,辽东地区有农业开发的地理优势和历史传统,取得农业生产的成就是在情理之中,开发成就十分显著。圣宗乾亨九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足见辽东农业生产的丰裕。道宗年间,“东京如咸信苏复辰海间银乌遂春泰等十余城内沿边诸州,各有和仓,依祖宗法,出陈易新,许民自愿假贷,收息二分。所在无虑二三十万硕,虽累兵兴,未尝用乏”^[26]。但有论者认为契丹辽朝在东京道的经济开发中存在重南轻北的倾向,即“为了保护宫廷权贵和地主阶级在南半部的特权和各种经济利益,进一步加强对南归和被遣戍防务各族的控制,防止生女真等族的反抗”,在混同江流域宁江州一带设置防御带,即“守边”,从而“严重影响了东京道及整个东北地区南半部和北半部的经济和其它方面的往来交流,极大地压抑着北半部经济的发展,造成和加重了南北半部在产业结构上新的不平衡状态”^[27]。这一论点忽略了辽东腹地在汉唐渤海国时期就已有较发达农业文明的基本事实,抹煞辽朝当局根据南北经济水平发挥不同地区比较经济优势的主观努力和客观成就。诚然,契丹辽朝在开发辽东的过程中也并非没有失误。如大延琳之乱便是由于“辽东新附之地不榷,而盐曲之禁亦弛”。圣宗时期却未能贯彻太祖以来对辽东的优惠政策,由于“冯延休、韩绍勋相继商利,欲与燕地平山例加绳约,其民病之”引起。但契丹辽朝当局很快便“连年诏复其租,民始安靖”^[28],纠正了政策偏差。因此,契丹辽朝对东京道原农业区的恢复成就应属主流。

辽太祖征服渤海后,崩逝于龙化州,继位的太宗继续致力于对邻近契丹本部的燕云地区的争夺。中原五代的王朝更迭使契丹辽朝骤然获得燕云版图。石敬瑭为答谢辽太宗的援立之功,把燕云十六州划归契丹。由于对燕云的获得属于和平接收,使契丹统治者有可能采取不同于上京、

东京地区的政策。对基本为草原的上京道西拉木伦河流域地区的农业开发,和对有农业地理基础和历史传统的东京道辽东地区的恢复,契丹统治者都采取了强制性移民的政策。而燕云地区的整体接收则避免了这样的社会动荡。州县行政单位基本保留,于是契丹统治者在燕云地区所需要做的只是尽可能维护与巩固这一比草原地区先进的农业区的现有局面,使这块农业区成为国家的重要赋源,并带动全国经济的发展和经济一体化的实现。虽然燕云地区即南京和西京道地区的州县基本维持原状,但是由于其东北部不属于燕云十六州范围的平、营二州早在太祖时代就已开始经略,因此其州县性质仍然属于移民州县:

平州 太祖天赞二年取之,以定州俘户错置其地。

安喜县 本汉令支县地,久废。太祖以定州安喜县俘户置。户五千。

望都县 本汉海阳县,久废。太祖以定州望都县俘户置。户三千。

营州 隋开皇置州。太祖以居定州俘户。^[29]

同时,契丹辽朝根据特殊经济政策的需要在州县设置上做了一定调整,新设了几个县:

香河县 本武清孙村。辽于新仓置榷盐院,居民聚集,因分武清三河路三县户置。户七千。

郭阴县 本汉泉山之霍村镇。辽每季春弋猎于延芳淀,居民成邑,就城改郭阴镇,后改为县。户五千。

大同县 本大同川地。重熙十七年西夏犯边,析云中县置。户一万。^[30]

长青县 本白登台地。辽始置县。户四千。

奉义县 本汉陶林县地。辽析云中置。户三千。

顺圣县 本魏安塞军,五代兵废。开泰八年以汉户复置。

振武县 本襄郡盛乐县。元魏尝都盛乐,即此。唐武德四年克突厥,建云中都督府。太祖神册元年伐吐浑还,攻之,尽俘其民以东,唯存乡兵三百人防戍。后更为县。^[31]

总之,燕云地区基本保持接收前中原王朝旧的行政格局。但仍然有两县属于榷鲁朵州县。一为南京道的行唐县,一为西京道的望云县:

行唐县 本定州行唐县。太祖掠定州破行唐

尽迁其民,北至檀州,择旷土居之。凡置十寨仍名行唐县。隶彰愍宫。户三千。^[32]

望云县 本望云川地。景宗于此建潜邸,因而成井肆。穆宗崩,景宗入绍国统,号御庄。后置望云县,直隶彰愍宫,附庸于此。户一千。^[33]

行唐县确属移民州县,在南京道属于特例,是太祖时期的历史遗留问题,与契丹辽朝对燕云州县的总体政策无关。望云县设置与景宗身世有特殊关联,在西京道属于特例,也与契丹辽朝的燕云政策无关。

燕云地区的农业生产水平和商品经济程度本来就优于契丹本部,并入契丹版图后,其农业生产和商品经济活动稳中有升,为契丹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形成奠定了牢固基础。会同元年,太宗与群臣朝议,“问军国事务,左右对曰:‘军国之务,爱民为本,民富则兵足,兵足则国强。上深然之。是年诏征诸道兵,仍戒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34],确定了休养生息、爱民劝农的施政方向。云州地区并入后,很快就在稳固西南边境的战争中做出贡献。“应历间,云州进嘉禾,时谓重农所召。保宁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助之”^[35]。这说明契丹辽朝当局不仅贯彻了重农政策,而且很快收到实效,支持了附属国北汉抵御宋朝的自卫战争。更难得的是这个成绩的取得还是在契丹辽朝历史上政治最黑暗的穆宗时代获得的。由于燕云地区地处战争前沿,社会生产不可避免受到战争波及。即便如此,契丹统治者仍然不忘以农为本,尽力扶持农桑。景宗“乾亨四年契丹以山后诸州给兵,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兵,乃诏复今年租。又敕诸州有逃户庄田许蕃汉人承佃供给租税,五周年内贵业者,三分交还二分,十周年内还一半,十五周年内三分还一分,诈认者罪之”^[36]。这一政策得到汉族官员的响应。“太师韩德让言,兵后逋民弃业,禾稼栖苗,募人获之,以半给获者。政事令室亦言,山西诸州给军兴,民力凋敝,田谷多躏于边兵,请复今年租。又徙吉避寨居民三百户于檀顺蓟三州择沃壤,给牛种谷”^[37]。契丹统治者还善于调整土地经营方式,采取多种土地所有制并行的政策,刺激农业生产。“统和十五年,募民耕滦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又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

入税,此私田制也”。^[38]契丹辽朝对燕云农业生产的维护还表现在积极推行义仓制度上。统和十三年,“诏诸道置义仓。岁秋,社民随所获,户出粟仓,社司籍其目。岁俭,发以赈民”;同时“禁诸军官非时畋牧妨农”,克服契丹贵族游牧积习对农耕的破坏。圣宗对燕云百姓体恤有加。他发布诏书,表示:“朕惟百姓徭役烦重,则多给工价,年谷不登,发仓以贷,田园荒废者,则给牛种以助之”,通过市场价格杠杆和国家政策扶持相结合的手段,减轻百姓因国家赋役负担沉重而造成的破产现象。结果当圣宗“太平初幸燕,燕民以年丰进土产珍异。上礼高年,惠鰥寡,赐连日”^[39],一派太平盛世景象。南京道的商品经济在契丹辽朝属于发达地区,延续了中原王朝统治燕云地区时的繁荣。南京析津府“城北有市,百物山,命有司治其征”^[40]。圣宗时期,燕云之间的贸易壁垒也被打破。“统和初,燕京留守司言,民艰食,请弛居庸关税,以通山西易”^[41]。总之,契丹辽朝对燕云地区的有效治理,是通过基本保持原行政建制,从而稳定社会秩序,并进而通过劝农政策来实现的。到澶渊之盟,燕云地区既然摆脱了战争前沿的重负,其经济发展方向更由于从支援战争转向滋养内部经济整合,从而有力促进了契丹辽朝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形成。

三、中京的营建和契丹辽朝国家经济统一体的形成

澶渊之盟之后的第三年即1007年,契丹辽朝开始营建一座新的京城。大定府被升级为中京,成为契丹辽朝的第四座京城。经过两年营建,中京开始初具规模。中京所处的土河即老哈河流域,本是奚族的牧居地。奚族在契丹的威压下早已“举族臣属”。圣宗“尝过七金山土河之滨,南望云气,有郭郭楼阁之状,因议建都。择良工于燕蓟,董役二岁,郭郭宫掖楼阁府库市肆廊庑,拟神都之制”。最后以奚王向朝廷献土的名义,“于统和二十四年,五帐院进故奚王牙帐地。二十五年城之,实以汉户,号曰中京,府曰大定”^[42]。现有研究表明,上京道经过一百年的移民开发,人口经济容量达到饱和,这成为契丹辽朝从上京道的西拉木伦河流域向中京道的老哈河流域移民的重要经济因素。^[43]但是中京在辽宋结盟后短短三年

后即开始营建,决不是偶然的。其中的政治因素不可轻易忽视。因为本来中京老哈河流域的社会经济条件相比四邻地区并无任何优越之处。宋使所见,“自过古北口几即蕃境,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所种皆从垄上,盖虞吹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橐,尤多青羊黄,亦有挈车帐逐水草射猎,食止糜粥”^[44],一派长城以北塞外农畜交错现象,单以自身经济实力难以承担成为国家经济重心的重任。但是其介于契丹本部、辽东和燕云汉地之间的居中地理位置,使之成为契丹统治者由军事征服转向内部整合,实现国家经济一体化的理想奠基所在。可是这块奚王领地,既然早就在契丹统治者的掌握之中,那为何迟迟不把大定府像建立东京和南京那样升级为京城,而仍然保留奚王领地的格局,这的确是一个需要详细考察的问题。更何况契丹统治者对这一地区的开发早在太祖时期就已经开始,契丹辽朝前期在上京、东京道地区设置移民州县的浪潮早已波及到老哈河流域:

恩州 本汉新安平县地。太宗建州。开泰中以渤海户实之。初隶永兴宫,后属中京。

惠州 本唐归义州地。太祖俘汉民数百户免麋山下,创城居之,置州,属中京。

武安州 唐沃州地。太祖俘汉民居木叶山下,因建城以迁之,号杏新城。复以辽西户益之,更曰新州。统和八年改今名。

榆州 本汉临渝县地。太宗南征,横帐解里以所俘镇州民置州。天泰中没入。属中京。

泽州 本汉土琅县地。太祖俘蔚州民,立寨居之,采炼陷河银冶。隶中京留守司。开泰中置泽州。属中京。

兴中府 本霸州彰武军,汉柳城县地。后为奚所据。太祖平奚及俘燕民,将建城,命韩知方择起处,乃完葺柳城,号霸州彰武军。统和中制置建霸宜锦白川五州,寻落制置,隶积庆宫。后属兴圣宫。重熙十年升兴中府。

兴中县 本汉柳城县地。太祖掠汉民居此。建霸城县。重熙中置府,更名。

黔州 阜昌军 本汉辽西郡地。太祖平渤海,以所俘户居之。隶黑水河提辖司。安帝(穆宗)

置州,析宜霸二州汉户益之。初隶永兴宫,更隶中京,后置府。

盛吉县 太祖平渤海,俘兴州盛吉县民来居,因置县。

宜州 本辽西垒县地。兴宗以定州俘户建州,隶积庆宫。

弘城县 世宗以定州俘户置。民工织纫,多技巧。

锦州 本汉辽东无虑州。太祖以汉俘建州。隶弘义宫。

岩州 本汉海阳县地。太祖平渤海,迁汉户杂居兴州境,兴宗于此建城焉。隶弘义宫。

川州 本唐青山州地。太祖弟明王安端置。安端子察割以大逆诛,没入。初隶崇德宫,统和中属文忠王府。^[45]

以上州县,如榆州、泽州等已深入到中京道腹地,兴中府更是联系东京道、中京道二道地区的交通枢纽。因此契丹辽朝完全有条件使中京道地区的农业开发与上京、东京两道同步,特别是在燕云地区并入后,对中京地区实施大规模移民开垦。但是对这一地区的大规模移民,并相应建立州县,是在中京建成之后才陆续展开。统和和开泰年间,契丹辽朝主要是通过从其他斡鲁朵中“析分宫户”以及从上京析出民户的方式作为建置州县的人户来源:

富庶县 本汉新安平县地。开泰二年析(上)京民置。

劝农县 本汉宝从县地。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文定县 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升平县 开泰二年析京民置。

弘理县 统和八年以诸宫提辖司户置。^[46]

但仍有个别州县是通过移民方式实现的。如:

三韩县 开泰中,圣宗伐高丽,俘三国之遗人置县。户五千。^[47]

润州,海阳军 圣宗平大延琳,迁宁州之民居此。^[48]

因此,契丹辽朝营建中京的政治意义便颇值得思考。因为恰恰是澶渊之盟成为中京营建的契机,而中京的营建又成为老哈河流域农业开发高潮的起点。笔者认为,正是澶渊之盟改变了契丹辽朝国家的战略方向。长期对宋朝的战争使整个

国家以对外扩张为主要方向和中心任务,即便具有保卫燕云的自卫性质。于是,南京和西京两道尽管在辽朝属于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但是由于处于战争前沿,而使这两个汉族农业地区很难为契丹辽朝国家经济的整合发挥黏合剂作用。因为它们都必须首先服务于战争勤务任务。同时,北部的上京和东京二道或者尚处于开发起步阶段,或处于恢复阶段,各自经济发展相对独立,缺乏国家决策层有效的经济整合措施的凝聚,均难以发挥国家经济统一体的龙头作用。而澶渊之盟后契丹辽朝国家财政负担因宋朝的岁币而减轻,国家对外扩张的发展方向转为内敛整合,特别是燕云农业区的战争任务的中止客观上增加了它们为国家经济一体化提供经济基础支持的力量。而中京介于南京、西京、上京和东京之间的绝佳地理位置,便成为契丹辽朝构建国家经济统一体的联结点 and 枢纽。

中京道在圣宗统和和开泰年间完成州县设置后,从空间地理角度考察,大体形成中京大定府、兴中府和沿渤海湾从北而南从锦州依次到润州三片经济区。中京居于全国交通的枢纽,兴中府地处中京和东京之间的要冲,沿渤海湾州县则是沿辽西走廊南麓连接华北和东北的交通要道。经过移民开发,中京地区的农业开发成就和其他各道一样显著。道宗初年,能吏马人望“迁中京度支使,视事半岁,积粟十五万斛。辽之农谷至是为盛”^[49]。如无一定农业生产的积累,再善于理财的官员也不可能仅仅半年就“积粟十五万斛”。

因此,以中京的营建为标志,契丹辽朝国家经济区域整合初步完成。

首先,以五京所置财赋机构为经济管理手段的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行政格局初步形成,以五京为中心的国内商业体系初步完备,国内市场体系与边境贸易成功嫁接,并融入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贸易体系中。

契丹辽朝虽然政令出自皇帝捺钵行营宫帐,但国家管理经济的职能却能够通过设置于五京内的经济管理职能部门得以有效运转。现存史料显示了中京营建后契丹辽朝五京管理国家经济的情况。虽然西京大同府是在中京营建五十年后因西夏军务而升级为第五座京城,但是大同府在云州地区的政

治经济中心地位早已在历史发展中形成。而对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契丹辽朝来说,以五京为中心的国家权力中枢对经济管理能力的加强和完善,能够有效弥补因商品经济水平落后自发促进经济一体化动力的不足。契丹辽朝在“五京及长春辽西平州置盐铁转运度支钱帛诸司以掌出纳”^[50]。虽然限于史料残缺,具体运作状况已难详述,但官制中关于五京经济管理部门的设置线索仍然比较明晰。特别是契丹统治者贯彻“因俗而治”的统治方针,发挥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因此五京经济管理职能的职官设置,体现出因地制宜的特点,所谓“辽有五京,上京为皇都,凡朝官京官皆有之,余四京随宜设官,为制不一,大抵西京多边防官,南京中京多财赋官”。具体到经济管理部门,有上京盐铁使司、中京户部使司、南京三司使司、南京转运使司、西京计司的设置^[51]。所谓“随宜设官”恰恰发挥了地方区域经济的比较优势,并体现“因俗而治”的原则。经济相对落后、开发较晚的上京道地区,由于农业生产长期处于自给状态,因此赋税主要来源于盐铁专卖收入。经济发达的燕云即南京、西京二道以及东京道的辽东腹地,则专门设立综合性的财政部门户部使、转运使、度支使等,即便多边防官的西京道也设有计司。上述史料均反映的是中京营建后行政格局下经济管理职能部门的设置情况。另有宋人余靖记载:“胡人司会之官,虽于燕京置三司使,惟掌燕蓟涿易檀顺等州钱帛耳。又于平州置钱帛司营滦等州属焉,中京置度支使,宜霸等州隶焉。东京置户部使,辽西川锦等州属焉。上京置盐铁使,饶泽等州隶焉。善后置转运使,云应等州隶焉。置使虽殊,其实各分方域,董其出纳也。”^[52]与辽史可做参照。

中京的地位在澶渊之盟后得到契丹统治者的特意强调。学术界有是否辽朝后期迁都中京的争议。^[53]事实上澶渊之盟后契丹辽朝执政的承天太后和圣宗便常驻中京,而中京在五京中的突出地位,也在捺钵行营制度中得到强调。契丹辽朝皇帝的四时捺钵习惯并不妨碍统一中央皇权的实施,所谓“皇帝四时巡守,契丹大小内外臣僚并应役次人及汉人宣徽院所管百司皆从。汉人枢密院、中书省唯摘宰相一员,枢密院都副承旨二员,令史十人、中

书令史一人、御史台、大理寺选摘一人扈从。每岁正月上旬,车驾启行,宰相以下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除拜官僚,止行堂帖权差,俟会议行在所取旨出给诰敕。文官县令录事以下更不奏闻,听中书铨选,武官须奏闻”^[54]。史料反映了中京营建后捺钵营卫制度的大概,说明皇帝虽然“四时巡守”,但是并不因此废弃留守常设官署的权限。以宰相为首的南面朝官,其职能的发挥仍然需要通过“还于中京居守,行遣汉人一切公事”来落实。中京在契丹辽朝皇帝心目中的地位可见一斑。可以说,中京是捺钵中的皇帝对汉族地区统治的体现。即便中京在法理上无法取代居于契丹本部的上京皇都的地位,但它在辽中期后的独特政治地位仍然无法忽视。不仅五京设置财赋官以管理国家经济事务,财赋官的设置更在州一级得到强化,而且其设置多在中京营建之后。如长春州钱帛司于兴宗重熙二十二年设置,辽西路钱帛司、平州路钱帛司、山西路都转运使司、奉圣州转运使司、蔚州转运使司、应州转运使司、朔州转运使司、保州转运使司,均设置于圣宗开泰三年。^[55]由于契丹辽朝整体商品经济水平低于中原王朝,因此城市作为经济中心的功能相对薄弱。如前辈学者所论,“契丹的工商城市,不是城市本身按经济发展,以市民为主而形成的工商业基地,主要是为供应统治集团用品而发展起来的”^[56]。又有前辈学者论上京和中京,“同中原城市一样,都具有它的政治意义,但在契丹这种政治上的职能却转变为经济职能”^[57]。因此,依靠设置在各区域政治中心城市如五京以及次一级政治中心如平州、长春州的经济管理机构,是政府通过税收等宏观经济手段对国家经济进行调节与管理,以强化国家经济统一体的重要行政工具。

中京营建后,契丹辽朝的国内商业体系逐渐趋于完备。始于太祖置羊城“起榷务以通诸道市易”开始构建的商业体系,渐成规模与网络。随着疆土的开辟,“太宗得燕,置南京,城北有市,百物山,命有司治其征。余四京及其它州县货产懋迁之地,置亦如是。东平郡城中置看楼,分南北市,禺中交易市北,午漏下交易市南”^[58]。开泰九年,“燕地饥,户部副使王嘉请造船,募习海漕者移辽东粟饷燕,议者称道险不便而寝”^[59]。此举虽未成功推行,但是体现了东京、南京两大经济区贸易

往来的迫切愿望。

同时,各级地方市场也逐渐发展起来。随宫卫捺钵的行宫市场得以规范。宋人沈括使辽至永安山捺钵处,见“犊儿北十余里,曰市场,小民之为市者,以车从之于山间”^[63],即为随行宫四时迁徙的初级市场。为保证市场秩序的公正,圣宗“令有司谕诸行宫,布帛短狭不中尺度者,不鬻于市”^[64]。道宗清宁三年十二月“禁职官于部内假货贸易”^[65]。为增进部族间的贸易往来,圣宗“诏以南北府市场人少,宜率当部车百乘赴集”。契丹统治者鼓励内地部族积极参与贸易活动。“时北大王耶律室鲁以俸羊多阙,部贫乏,请以羸老之羊及皮毛易南中之绢,上下为便”^[66]。开泰元年十二月,国家开始向斡鲁朵州县征税,诏令“贵德、龙化、仪坤、双、辽、同、祖七州至是有诏始征商”^[64],标志着国家对商业体系构建力度的进一步加强。

国内市场体系和网络的逐步完备,更由于边境贸易的活跃,而使契丹辽朝经济纳入到以经济发达的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贸易体系中。契丹辽朝在“雄州高昌渤海亦立互市,以通南京、西北诸部、高丽之货,故女直以金帛布蜜蜡诸药材,及铁离莫河于厥等部以蛤珠青鼠貂鼠胶鱼之皮牛头驼马等物来易于辽者,道路属”^[67]。但是契丹辽朝对宋朝的榷场贸易仍然是最重要的。由于辽史史料的缺乏,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多是通过宋史资料获得的。

契丹在(宋)太祖时听沿边市易而未存官署。(宋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始令镇易雄霸沧州各只换榷务,犴香药犀及茶与贸易。后有范阳之师,罢不与通……景德初复通好,请商贾即新城贸易,诏北商齐货物至境上则许之。二年,令雄霸州安肃军置三榷场,被商趋他路者勿与为市,遣都官员外郎孔揆等乘传三榷场,与转运使刘粽等所在长吏,平互市物价,稍优其值予之。又于广信军置场,皆廷臣专掌,通判兼领焉。^[68]

可见,榷场贸易为辽宋双方边境贸易往来之必需,只因战事而时兴时废,直到澶渊之盟后始制度化。据前辈学者考证,辽宋双方所置榷场基本在宋境内,有东部边境的雄、霸二州和安肃、广信二军以及西部边境的久良津五处。辽境内西京道面对宋久良津榷场,辟有东偏头村榷场一处。^[69]

另,辽史有圣宗统和年间,“开奇峰路以通易州贸易”^[68]的记载,当指对宋的官方榷场贸易而言。同时,契丹辽朝还以西京为中心,通过两条古道对宋朝展开边境贸易。一为与河东的贸易路线,介于吕梁山脉和太行山脉之间,由大同盆地南至太原盆地;一为通向河北平原的飞狐道,由大同盆地东越恒山山脉和滹沱河,到达蔚州和涞源。^[69]

但是由官方控制的榷场贸易并不能反映辽宋贸易的全貌。因为统治集团出于国家政治斗争需要,不可能充分满足双方贸易特别是民间贸易的实际需要,尤其是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对契丹辽朝存在明显的贸易保护倾向。因此民间贸易更多采取走私贸易的形式进行。由于契丹辽朝商品经济相对落后,所以走私贸易中宋朝铜钱的走私成为主要走私商品。宋朝方面屡加禁止也难以遏制。^[70]这是商品经济发展过程中流通规律使然,同时也说明处于东亚贸易体系中的契丹辽朝经济基本可看做宋朝经济的附庸。因为一种外国货币,一旦被契丹统治者和民众视为比本国货币更具有信用的硬通货,那走私贸易的性质就不仅仅单纯是边境贸易那样简单,而是对更发达市场的期待。

总之,以中京的营建为标志,契丹辽朝五京以财赋功能为主的经济管理职能得以发挥,国家整合区域经济的能力增强。同时商业体系逐渐形成,并通过与宋朝的榷场贸易以及民间走私贸易,逐渐融入到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家经济一体化的趋势已经难以阻挡。

其次,契丹辽朝以中京为中心的交通网络,对国家政治的凝聚力和在经济统一体的形成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

中京处于契丹辽朝南北东西各交通干道的交汇点上,因而起到枢纽作用。这一特点可为出使契丹辽朝的宋朝使臣的描述所证实。

路振《乘·录》载:

……十二月四日,过白沟河即巨马河也。五日,自白沟河北行,至新城县四十里。六日,自新城县北行,至涿州六十里。十五日过横沟河,三十五里过涿州,是夕宿于永宁馆。七日,自涿州北行,至良乡县六十里。八日,自良乡县北行,至幽州六十里……十日,自幽州北行,至孙侯馆五十

里……十里过高梁河,三十里过孤沟河,三十五里过长城。十一日自孙侯馆北行至顺州三十里……十二日,向顺州东北行至檀州八十里。十五日自虎北馆东北行,至新馆六十里。下虎北口山,即入奚界……十六日自新馆行,至卧如馆四十里。十七日自卧如馆北行至柳河馆六十里。十八日过柳河馆东北行至部落馆八十里。十九日,自部落馆东北行,至牛山馆五十里……二十四日牛山馆东北行,至鹿儿馆六十里……二十一日自鹿儿馆东北行,至铁浆馆八十里……二十二日自铁浆馆东北行,至富谷馆八十里……二十三日自富谷馆东北行,至通天馆八十里。二十四日自通天馆东北行至契丹国(中京)三十里……^[71]

王曾《上契丹事》载:

自雄州白沟驿渡河,四十里至新城县……又七十里至涿州……六十里至良乡县……六十里至幽州……出北门过古长城……四十里孙侯馆……五十里至顺州……七十里至檀州……五十里至金沟馆……九十里至古北口……八十里至新馆……四十里至卧如馆……七十里至柳河馆……七十里至打造部落馆,东南行五十里至牛山馆,八十里至鹿儿峡馆……九十里至铁浆馆……七十里至富谷馆……八十里至通天馆。二十里至中京大定府。^[72]

薛映《辽中境界》:

自中京正北八十里至临都馆,又四十里至官窑馆,又七十里至松山馆。又七十里至崇信馆。又九十里至广宁馆。又五十里至姚家寨馆。又五十里至咸宁馆。又三十里至保利馆,渡黑水河,七十里至宣化馆,又五十里至长泰馆。馆西四十里许有佛寺民舍,云即祖州……又四十里至上京临潢府。^[73]

宋绶《契丹风俗》:

……富谷馆八十里至通天馆,距中京二十里……凡六十里至河馆。过惠州……七十里至林馆……七十里至香山子馆……九十里至长泊馆。渡土河……凡八十里至张司空馆。七十里至木叶馆……^[74]

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

北白沟馆南距雄州三十八里……皆北行……涿州南距新城六十里……幽州西南距良乡六十里,馆曰永平……自州东北行三十里至望京

馆……自馆东北行少北十里余,出古长城……又二十里至顺州……登思乡岭……至卧如来馆……济滦水,东出,度摸斗岭,三十五里至柳河馆……逾度云岭三十五里至打造馆……至牛山馆……逾岭三所至鹿儿峡馆……至路口村……至铁浆馆……东行山间之川……至富谷馆……自馆东北行……至长兴馆……至临都馆……经小坂,自路由东出七八里,望之可见,曰恩州……行坂间二十里至崇信馆……过阴阳河至松山馆……西北走饶州、庆云岭……又三十余里至鹿驼帐……至广宁馆……澄州……至会星馆……至咸熙帐……稍西北过大,二十余里至黄河……至保和馆……北行数里有路北出走上京,稍西又数里济黑水……绝水有百余家……曰黑河州……至牛山帐……至锅窑帐……西北二十里……庆州……济黑河至大河帐……折西北逾奚都岭……又十余里牛心山帐……至新添帐……至顿程帐……帐西北又二十里至单于庭^[75]

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载:

……过白沟桥北……(五月)十二日至涿州……十七日到顺州……二十日至古北口馆,二十一日至新馆……二十二日至卧如来馆……二十三日过摘星岭……宿柳河馆。二十四日登摸斗岭……宿打造馆。二十五日过会仙石……宿牛山馆。二十六日登松子岭……宿鹿峡馆。二十七日至铁浆馆。二十八日至富谷馆……二十九日至长兴馆。六月一日至中京。……五日至松山馆。六日至崇信馆。七日至广宁馆。道过小城之西,丰州也。……宿会星馆。九日至咸熙馆。十日过黄河。……十一日黑崖馆至三山馆。……十二日至赤崖馆……十四日至中路馆……^[76]

以上宋使行程所记,可充分证明中京的交通枢纽地位。有的使者的目的地即为中京,也有使者以上京为目的,但是也必须由中京中转。从辽南京到中京的路线相对固定,由望京馆,经顺州、檀州、金沟馆,过古北口,即深入奚境即中京道。再经新馆、卧如来馆、滦州、柳河馆、打造部落馆、牛山馆、鹿峡馆,到路口村,是为所谓“古北”和“松亭”两路的交点。松亭关路由南京出发,不经古北口,而是由松亭关进入奚境的道路。这条路是出幽州东北向,经通州、三河、蓟州、石门,出

喜峰口、松亭关后,由泽州到路口村,和宋使习惯走的古北口路会合。^[77]此路虽不为宋使常走,但是古来有之,辽时当不会废弃,应该是一条南北交通主干道的支线。宋使一般走古北口路,然后经铁浆馆、富谷馆和通天馆而抵达中京。^[78]另有宋使继续北上,循临都馆、缸窑馆、松山馆、高州、广宁馆、丰州、会星馆、咸熙馆、黑水馆、保和馆而达上京。宋使一路北上均驻馆驿,且有馆伴承应。契丹辽朝方面对此极为重视,沿途“奚民守馆者皆给土田以营养焉”^[79]。虽然路途遥远险峻,但在契丹辽朝时代,官道势必成为沟通地区之间政治与经济交流的生命线。既然为外使所必经,其政治意义显然。同时从经济交流层面考虑,既然契丹辽朝商品经济不发达,其五京为各地区商业中心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国家宏观经济管理机构所在,因此连接五京的政治道路自然也承担起沟通区域经济区之间交流的作用。

连接中京和东京的交通道路,曾公亮《北蕃地理》提供了依稀线索:

(自东京)西六十里至鹤柱馆,又九十里至辽水馆。又七十里至闾山馆,在医巫闾山中。又九十里至独山馆,又六十里至唐叶馆,又五十里至乾州。微北六十里至杨家砦。又五十里至辽州,北六十里至宜州,又百里至牛心山馆……又六十里至霸州。各又七十里至建安馆,五十里至富水会安。至中京三驿河。^[80]

另外,后晋灭亡后,出帝北迁的道路也可提供新的线索:

自幽州北行十余日,过平州……榆关……又行七八日至锦州……又行五六日过海北州,至东丹王墓……又行十余日,渡辽水至渤海国铁州,又行七八日过南海府,遂至黄龙府。^[81]

这条路线,经历史地理学者考证,从幽州北上,出榆关即山海关,由锦州北上医巫闾山,经乾州即东丹王墓,再经海州、海北州、鹤野县到东京辽阳府,再经沈州东郊县、兴州、银州延津县、同州东平县、咸州咸平县、肃州清安县、安州、韩州柳河县、信州武昌县,最后到达黄龙府。^[82]这一路线不仅是循辽西走廊北端,连接辽南京和东京的交通干道,也是连接东京道辽东腹地与女真边界地区的重要交通干线,其政治和经济地位均十

分突出。由此可以推想,前述圣宗时代之所以在中京道沿渤海湾,从北而南从锦州到润州依次设置一系列州县的目的,或有保证沿辽西走廊南麓连接南京道和东京道即华北和东北之间交通要道的意义。

以上情况充分表明中京在契丹辽朝交通体系中的中心地位。因为中京在五京中的中心位置,使之成为南北和东西交通各条干道的交汇之处。这也符合契丹统治者营建中京的政治需要。虽然如前辈学者所指出的,“根据交通运输的情况,境内还未能消灭区域间的独立性,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社会经济的发展”^[83]。但这主要是由于自然地理条件使然,不应否认契丹辽朝主观努力下交通网络逐渐形成的趋势。

四、边防城的设置对国家经济统一体的屏护

澶渊之盟后,通过中京的营建,契丹辽朝整个国家政治重心内敛,经济一体化在五京框架内得以逐步整合。于是契丹辽朝沿边境建立的边防城便成为拱卫这一国家经济统一体的外部屏障。

契丹辽朝的边防城以拱卫西北边境为主要任务,所谓“辽国西北界边防城因屯戍而立,各据形胜,不资丁赋”。“屯戍”和“不资丁赋”,前者有军屯涵义,后者则说明尽管这些边防城的生产活动以农业为主,但是由于其特殊军事任务而不能和内地一般州县相提并论。以下为一些边防城的设置信息:

静州 本泰州之金山。天庆六年升。

镇州 本古可敦城。统和二十二年皇太妃奏置,选诸部族二万余骑充屯军,专捍御皇帝室韦、羽厥等国,凡有征讨,不得抽移。渤海、女直、汉人配流之家七百户,分居镇防维三州。

河董城 本回鹘可敦城。久废。辽人完之以防边患。高州县女直常为盗,劫掠行旅,迁其族于此。

静边城 本契丹二十部族水草地。北邻羽厥,每入为盗,建城,置兵千余骑防之。

皮被河城 地控北边,置兵五百于此防托。

招州 开泰三年以女直户置。

塔懒主城 大康九年置。在胪河。^[84]

另有西京道的金肃州、河清军,由于是在兴宗对西夏用兵期间特设,因此性质与边防城相近。

金肃州 重熙十二年伐西夏置。割燕民三百

户防秋军一千实之。

河清军 西夏归辽,开直路以趋上京。重熙十二年建城,号河清军。徙民五百户防秋兵一千人实之。^[6]

上述史料可提供如下信息:边防城一般或有前代故址可做建城依托如“本古可敦城”,或有一定农业生产条件如“部族水草地”,说明自古以来这条边防线就是经营北疆对外扩张的极限,素有军屯传统。这样边防城的设立便成为契丹辽朝以农耕文明抵御游牧民族袭扰的一道人工连缀的“草原长城”。边防城是否成功也因此成为契丹辽朝国家经济一体化进程成功与否的外部保障。因为如果这道边防城不能成功拱卫契丹辽朝的安全,整个国家便不能有效聚合国力,致力于国家经济一体化的构建。

契丹辽朝西北垦戍的成就与危机并存。太宗时,“以乌古之地水草丰美,命瓠昆石烈居之,益以海勒水之善地为农田。三年,诏以谐里河牐河近地,赐南院欧董突吕、乙斯勒、北院温纳河刺三石烈人以事耕种”^[7]。道宗初年,朝廷“命耶律唐古督耕稼以给西军,唐古率众田牐河侧,岁登上熟,移屯镇州,凡十四,积粟数十万斛,每斗不过数钱”。但是由于边防垦戍条件恶劣,边防城的生存状况普遍并不乐观。“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官之役”^[8],负担十分沉重。因此,彰愍宫使萧韩家奴献策,既然“西北之民,徭役日增,生业日殫,警急既不能救,叛服亦复不恒。空有广地之名,而无得地之实”,不如“恩结诸部,释罪而归地,内徙戍兵以增堡障,外明约束以正疆界。每部各置酋长,岁修职贡”,放弃边防城而内迁,采取对敌对部落的抚绥政策。^[9]该献策是否被采纳无从查考。但是东北宁江州被女真突破一点便导致契丹辽朝的全局崩溃的事实,说明边防城确实不可轻易言弃,而耶律大石西迁时能够招集三十余部落随从西迁,或也可说明萧韩家奴的抚绥策略或真的被兴宗采纳。

综上所述,契丹辽朝的国家经济区域整合,在先后经历了对上京道契丹本部的移民开发、对辽东地区移民的农业恢复以及接收燕云地区后实施的劝农政策,为在契丹辽朝各地区区域经

济发展并发挥各自比较优势的基础上,实现经济区域整合准备了条件。中京的营建成为国家经济区域整合的开始和契机。随着澶渊之盟后整个国家将主要精力转向和平建设,国家政治方向从对外扩张转向内敛,各经济区域之间的整合趋势日益加强。由于契丹辽朝整体商品经济水平较中原王朝低下,因此中京的营建促进了以五京所置财赋机构为管理手段的国家宏观管理经济的行政格局的形成。在国内商业体系逐渐完备的同时,国家经济也由于与宋朝的官方榷场贸易和民间走私贸易而融入东亚经济贸易圈中。以中京为中心的交通体系的日益完备加强了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凝聚力,而边防城的屯垦则为这一经济统一体提供了外部保障。

参考文献:

- [1] 相关研究论著可参见陈述. 契丹社会经济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79. 漆侠,乔幼梅. 辽夏金经济史[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 张正明. 契丹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79. 舒焚. 辽史稿[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4. 姚从吾. 姚从吾先生全集(二)[M].辽朝史[M].台北:正中书局,1972. 韩茂莉. 辽金农业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韩茂莉. 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农牧业和环境[M].北京:三联书店,2006. 等.
- [2] 张正明. 契丹史略[M].北京:中华书局,1979. 53.
- [3] 傅乐焕. 辽史丛考[M].北京:中华书局,1984. 96.
- [4] 理论上讲,在资本主义制度确立前的前资本主义时代,东方亚细亚社会由于商品货币经济发展水平有限,加之受制于交通和地理因素,不可能形成统一的国家市场。但是中国历代封建王朝,无论是统一的王朝,还是疆土辽阔囊括多经济地理单元的王朝,在实现政治大一统的同时,无不致力于国家各经济区域的整合,以巩固政治统一的成果。如秦始皇修灵渠以开发岭南,隋炀帝修大运河以沟通南北交通等等,都是统一王朝致力国家经济整合的时代壮举。同时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以农耕作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特点,要求王朝统治者必须为该王朝的经济统一体构筑外围屏障,防止草原游牧民族的掳掠。如从秦始皇开始历代之修筑长城。笔者将这一行政努力命名为国家经济区域整合。
- [5] (元)脱脱等. 辽史(卷59 食货志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4. 923-924.

- [6]辽史卷第七地理志一[M].439-451.
- [7]辽史卷三十一营卫志上[M].362.
- [8]张绩墓志铭,陈述.全辽文(卷八)[M].北京:中华书局,1982,179.
- [9]辽史卷四十九礼志一[M].838.
- [10][84]辽史地理志一[M].448、450-451.
- [11]韩茂莉.辽金农业地理[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45.
- [12][13][14][15][18][20][21]辽史地理志,442、446、445-446、447、441、442、448
- [16][43]韩茂莉.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的农牧业和环境[M].北京:三联书店,2006,130-131、131.
- [17][59][61]辽史食货志[M].929、925、929.
- [19]胡峤.陷辽记[A].贾敬颜.五代辽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C].北京:中华书局,2004,21.
- [22][56][83]陈述.契丹社会经济史稿[M].北京:三联书店,1979,27、98、146.
- [23]姚从吾.说阿保机时代的汉城[A].姚从吾.东北史论丛(上)[C].台北:中正书局,1967,212-213.
- [24]辽史地理志二[M].459-477.
- [25]辽史卷七十五列传第五[M].1238.
- [26]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M].924-925.
- [27]林荣贵.辽朝经营与开发北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205.
- [28]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M].926.
- [29]辽史卷四十地理志四[M].500-501.
- [30][32]地理志四[M].495-496、497.
- [31][33][85]地理志五[M].506-508、510、514-515.
- [34][49][50][86][87]辽史食货志上[M].924、925、923、924、926.
- [35]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M].924.
- [36]厉鄂.辽史拾遗(卷六)[M].北京:中华书局,1985,113.
- [37][38][39]辽史卷五十九食货志上[M].924、926、924-925.
- [40][41]辽史卷六十食货志下[M].929、929.
- [42]辽史卷三十九志第九地理志三[M].481-482.
- [44]王曾.上契丹书[A].贾敬颜.五代辽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C].北京:中华书局,2004,103.
- [45][47][48]辽史地理志三[M].482-488、483、489
- [46]辽史卷三十九志第九地理志三[M].482.
- [51]辽史百官志[M].802-804.
- [52]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A].辽史拾遗卷十五[C].316.
- [53]谭其骧先生认为契丹辽朝事实上已经迁都到中京.谭其骧《辽后期迁都中京考实》,中华文史论丛1980年第二辑,而杨若薇认为“辽朝国家政治中心在韩鲁朵并非京城,辽后期无论从名义上法律上还是事实上都没有迁都中京”.杨若薇《契丹王朝政治军事制度研究》,天津出版社,第195页.其实,问题的关键并非是否迁都中京,而是为何在渊之盟后立即开始营建中京.谭氏所论恰恰证实中京营建对契丹辽朝的特殊意义,而杨氏无非重复契丹政令出于韩鲁朵捺钵宫帐这一基本常识而已.
- [54]辽史营卫志上[M].375-376.
- [55]辽史百官志四卷四十八[M].822-823.
- [57]漆侠,乔幼梅.辽夏金经济史[M].石家庄:河北大学出版社,1994,94.
- [58][65]辽史食货志下[M].
- [60][75]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A].贾敬颜.五代辽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C].北京:中华书局,2004,169、133-168.
- [62]辽史卷二十一纪二十一道宗一[M].256.
- [63][68]辽史食货志下[M].929-930、929.
- [64]辽史卷十五纪十五圣宗六[M].172.
- [66](元)脱脱等.宋史·食货志下八[M].北京:中华书局,1977,4578.
- [67]张亮采.宋辽间的榷场贸易[J].东北师范大学科学集刊,1957(3).
- [69]马志强.略论西京大同在辽宋贸易中的地位[J].昭乌达蒙族师专学报,1997(3).
- [70]张庆龄.宋辽间的走私贸易[J].史林,1988(2).
- [71][79]路振.乘录[A].贾敬颜.五代辽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C].北京:中华书局,2004,39-59、76.
- [72]王曾.上契丹事[A].贾敬颜.五代辽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C].北京:中华书局,2004,87-101.
- [73]薛映.辽中境界[A].贾敬颜.五代辽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C].北京:中华书局,2004,104-107.
- [74]宋绶.契丹风俗[A].贾敬颜.五代辽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C].北京:中华书局,2004,111-115.
- [76]陈襄.神宗皇帝即位使辽语录[A].契丹交通史料七种[C].广文书局,1972,65-72.
- [77][82]王绵厚,李健才.东北古代交通[M].沈阳:沈阳出版社,1990,194、211.
- [78]该路线已经考古证实.参见承德地区文化局辽驿调查组.辽中京至南京口外驿道调查[J].社会科学战线,1984(1).
- [80]曾公亮.北蕃地理[A].契丹交通史料七种[C].广文书局,1972,19.
- [81]欧阳修.新五代史·晋家人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178.
- [88]辽史卷一百三十列传三十三文学上[M].1447.